

# 母国制度环境与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制度能力和国际化导向的作用

□ 黄 胜 叶广宇 周劲波<sup>①</sup>

**摘 要：**企业高管的母国制度感知和经历如何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现有文献对此缺乏充分认识。在对高管制度能力进行界定和量表开发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制度基础观、动态管理者能力理论和战略导向观等理论视角，以我国349家国际新创企业为样本数据，本文研究了高管的母国制度感知和经历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显示：①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有利于提高其制度能力，而制度能力有助于新创企业加快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②制度能力在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与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国际化导向越强，制度能力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越大。

**关键词：**制度不确定性；制度多样性；制度能力；国际化速度；国际化导向

## 一、引言

在构建创业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背景下，越来越多中国新创企业通过快速整合全球资源和进军国际市场以开发基于时间的竞争优势，即新创企业快速国际化现象。虽然我国出现这一现象绝非偶然，但是目前大部分中国新创企业没有任何

---

<sup>①</sup> 黄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叶广宇，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周劲波（E-mail: jbzhou@163.com），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文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际机会动态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GD16YGL04）、“制度环境、制度能力对创业企业国际化战略绩效的动态影响”（GD14CGL1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机会导向动态影响国际创业绩效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2017A0303134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小企业动态国际创业模式绩效机制研究”（12AGL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制造：战略转型与价值链提升”（7157305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强服务业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路径研究”（17JZD020）、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科研专项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联合资助项目“基于创新驱动的中国东盟产业对接与价值链跃迁机制研究”（CWZD201509）资助。

国际客户，而且国际化进程非常缓慢<sup>①</sup>。这意味着我国大部分新创企业亟须借鉴小部分新创企业的国际化成功经验，从而加快其国际化步伐。该现象的本质之一——国际化速度是国际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Chetty et al., 2014）。Vermeulen 和 Barkema（2002）指出，企业绩效不仅取决于当前的战略态势，而且取决于如何构建战略态势（例如，国际化速度）。因此，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研究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际化速度作为继国际化深度和广度之后企业国际化的第三个维度，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新创企业国际化理论（Oviatt & McDougall, 1994）出现之后才被正式提出。虽然这个理论提高了我们对国际化速度的认识，但是大部分文献通常只关注初始进入速度，即企业创建与首次进军外国市场之间的时间间隔（Autio et al., 2000; Oviatt & McDougall, 2005），很少有研究去解释进入后速度，即新创企业一旦成为国际新创企业之后的国际扩张速度（Prashantham & Young, 2011）。企业国际化速度研究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议题（Hennart, 2014; Coviello, 2015），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Chetty et al., 2014）。

从制度基础观（Peng et al., 2008）的角度看，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必然会受到母国制度环境的影响。现有文献认为有利（Luo et al., 2010）和不利（Witt & Lewin, 2008; Yamakawa et al., 2008）的母国制度环境都是新创企业国

际化速度的重要驱动因素。此外，Kiss 和 Danis（2008, 2010）认为母国制度环境通过关系网络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产生间接影响。然而，制度基础观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存在如下缺口：其一，主要探讨制度缺失性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黄胜等，2015），尚未关注高级管理者（简称高管）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和制度多样性经历的潜在影响<sup>②</sup>；其二，笼统地分析母国制度环境对国际化速度这一整体概念的影响，未能深入到它的维度层面，尤其缺乏对进入后速度的影响进行分析；其三，主要使用社会网络和交易费用等相对静态的理论去解释母国制度环境与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动态能力理论视角，而且尚未识别母国制度环境影响国际化速度的边界条件。

除了母国制度环境之外，高管能力也是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个体能力视角下的相关研究探讨了机会识别和设定能力（Oviatt & McDougall, 2005）、创业导向能力（Weerawardena et al., 2007）及认知能力（Acedo & Jones, 2007）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积极影响。与个体能力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研究相比，高管能力如何开发的问题更少受到关注。Autio 等（2011）认为：在新创企业国际化背景下，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能力的开发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然而，Autio 等（2011）致力于分析新创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后组织能力开发的过程，并未回答在进入国际

① 据《全球创业观察 2015 中国报告》称，国内市场庞大的中国只有不到 20% 的新创企业涉足国际市场。根据初始进入速度的定义，如果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即新创企业）还没有国际客户，尚未进军国际市场，那么它们的初始进入速度（国际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比较慢的。

② 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企业管理者依据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而做出回应的过程（Miller & Shamsie, 1999）。管理者在制度环境下的切身经历是他们获得制度环境感知的重要方式，因此本文研究高管的主观制度感知和经历而不是客观制度环境。

市场之前高管的母国制度感知和经历如何影响其能力形成的问题。尽管有学者指出在不利制度环境中经营的能力会成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Kiss et al., 2012), 但我们目前还不清楚高管在与母国制度环境互动的过程中究竟形成了什么能力。

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背景下, 我国很多新创企业的高管都激起了强烈的国际化导向。国际化导向既是高管个体的重要特质, 也是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重要驱动因素 (Weerawardena et al., 2007)。除了国际化导向之外, 战略导向观视角下的相关研究 (Acedo & Jones, 2007; Weerawardena et al., 2007) 还关注了 (国际) 创业导向、学习导向、全球中心导向对新创企业初始进入速度的间接促进作用。尽管制度、能力和导向三个视角下的研究都提供了关于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深刻见解, 但是现有研究尚未探讨高管的国际化导向与其特定能力、母国制度感知和经历如何共同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通过弥补这一缺口, 本文有助于解释不同新创企业之间的国际化速度差异, 识别母国制度环境与国际化速度之间的重要中介和调节因素, 以及增加我们关于国际创业的知识。

可见, 现有文献尚未探索如下问题: 高管的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和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如何影响新创企业的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 组织学习理论、战略选择观和企业行为理论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大致思路。一方面, 目前中国正处于制度转型期, 我国高管面临着不确定和多样化的母国制度环境。在与母国制度环境互动的过程中, 他们通过积极学习开发了制度能力。制度能力的

应用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资源结构。根据战略选择观, 这种资源结构决定了新创企业的快速国际化战略。另一方面, 根据企业行为理论, 高管的国际化导向对上述资源结构的开发和配置等战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从而对制度能力与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 二、理论和假设

### (一) 高管的母国制度感知和经历对其制度能力开发的影响

来自新兴经济体的高管是否会形成一种植根于母国制度环境且有助于加快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独特能力? Yiu 等 (2007) 认为除了基于所有物或交易的企业资产之外, 处理制度环境的能力也是对新兴经济体新创企业从事国际创业活动所必需的。类似地, Kiss 等 (2012) 指出: 在不利的制度环境中经营的能力会成为新兴经济体国际新创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中国正处于经济制度的转型期, 其制度环境呈现出缺失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等特性, 这为制度能力的开发提供了现实基础。项国鹏等 (2009) 指出制度能力的理论基础是制度理论和能力理论, 它是这两种理论的整合性产物。可见, 对该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我们回顾了与制度能力相关的文献 (如表 1 所示)。例如, 虽然制度经验和制度知识都有定义和量表 (Eriksson et al., 1997; Perkins, 2014), 但是制度经验因含糊地介绍“知识模式”而显得过于笼统; 制度知识因简单介绍“是什么”的描述性知识而显得过于片面。又如, 虽然外国学者 (Henisz, 2003; Perkmann

& Spicer, 2007; Holburn & Zelner, 2010) 提出了与制度能力相关的概念, 但是他们要么没有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要么没有区分维度, 要么没有提出维度划分的依据。再如, 虽然项国鹏等 (2009) 认为企业家制度能力包含外部正式制度创新能力、外部非正式制度创新能力和

内部制度创新能力三个维度, 但他们承认这三个维度未经严格的统计学意义的效度和信度检验。与跨国公司组织层面的制度能力研究相比, 高管个体层面的制度能力研究相对较少。可见, 高管制度能力的定义、维度划分和量表开发都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表 1 制度能力相关文献的回顾

概念	定义	维度	量表	主体/层次	作者 (年份)
先前制度经验	在异质的制度环境内部或之间获取知识之后, 企业创造独特新知识的投资顺序和投资组合	制度经验的相似性、宽度和深度	有	跨国公司/组织层面	Perkins (2014)
外国制度知识	关于外国政府、制度机制、法规、规范和价值观的经验知识	无	有	渐进国际化企业/组织层面	Eriksson 等 (1997)
政治能力	评估政策风险和管理政策制定过程的能力	无	无	跨国公司/组织层面	Holburn 和 Zelner (2010)
制度创业者的项目部署技能	无	政治技能、分析技能、文化技能	无	创业者/个体层面	Perkmann 和 Spicer (2007)
管理制度异质性的能力	无	识别制度异质性的能力、阻碍不利或促进有利政策变化的能力、动态能力	无	跨国公司/组织层面	Henisz (2003)
企业家制度能力	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 突破企业创业过程中的外部和 (或) 内部制度性约束, 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	外部正式制度创新能力、外部非正式制度创新能力、内部制度创新能力	无	企业家/个体层面	项国鹏等 (2009)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通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 我们提炼出了制度能力的内涵和维度 (具体过程请见“附录 1”)。制度能力是指高管持续不断地与制度环境进行互动从而促进企业出现和成长的能力。其中, 制度感知能力是指在获取充分的制度环

境信息之后, 高管积极利用先前的工作经验来解读制度环境信息, 从而感知到制度环境给企业带来的机会或威胁的能力。制度适应能力是指在强大的制度压力下, 高管灵活调整企业的目标、经营方法和产出, 从而满足当前制度环

境要求的能力。制度协调能力是指在多样化的制度环境中，高管努力协调不一致的横向和纵向制度环境，从而达到提升效率与合乎规定双赢局面的能力。制度变革能力是指在缺失的制度环境中，高管阻碍现行制度变革或构建并推广新技术标准或商业模式，从而使制度环境满足企业利益要求的能力。制度更新能力是指在动态演化的制度环境中，高管通过学习、总结、交流制度经验或招募具有制度经验的新员工等方式不断提高自身感知、适应、协调和变革制度环境的技能，从而使企业与制度环境始终相互保持一致的能力。制度能力是它的五个维度背后的一个共同因素，并且是一个多维的二阶构念（请见“附录1”）。根据理论的简约性原则，本文使用二阶层面的制度能力进行假设开发和实证检验。

在社会学视角下，制度由象征性要素、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构成，并为采取、禁止和约束行动提供指南和资源（Scott, 1995）。制度不确定性是指制度变化及其对企业未来活动的影响难以预测的程度（Delios & Henisz, 2003）；制度多样性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国家或地方之间制度环境的差异程度及其比较制度优势（Banalieva & Dhanaraj, 2013; Jackson & Deeg, 2008）。外部环境对高管能力开发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两条：学习和认知铭记（Autio et al., 2011; Holburn & Zelner, 2010）。基于与外部环境协同演进的学习经历，高管可以开发和拓展他们的惯例（Levitt & March, 1988）。类似地，在试错性学习和“干中学”过程中，高管能够改进现有流程或创造新流程（Argote, 1999; Levitt & March, 1988）。动态能力研究更

加明确地指出：组织学习不仅推动动态能力的演化和升级，而且构成了路径依赖的基础（Eisenhardt & Martin, 2000）。组织学习源源不断地推动全新惯例的开发和原有惯例的修改，因而构成了动态能力的源泉（Zollo & Winter, 2002）。类似地，Tsoukas 和 Mylonopoulos（2006）认为：组织成员通过学习创造新知识并将新知识制度化和惯例化到组织流程中，从而开发了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态能力。铭记是指发生在某一关键发展阶段的重大事件所产生的持久或毕生影响的过程（Stinchcombe, 1965）。基于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经历，高管开发了一种心智模式——作为对现实世界的简化表现，然后用它来解释环境和引导自身行为（Walsh, 1995）。如果高管暴露在外环境中并且铭记了特定能力的重要性，那么这种铭记将影响企业投入资源以开发这种能力的决策，即能力开发的自我增加型路径依赖将被启动（Rosenbloom, 2000）。

一方面，高管的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越高，其制度能力越强。例如，Holburn 和 Zelner（2010）的研究发现：对政策制定者制度约束较弱（制度不确定性较高）国家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管理政策风险的能力。从学习理论（Argote, 1999）的角度看，不确定的母国制度环境增强了高管学习制度能力的动机。基于系统观的组织学习研究指出：环境是诱发组织学习的主要因素，而且组织必须去适应或操纵它（Easterby - Smith et al., 1999）。Holburn 和 Zelner（2010）认为不确定性正向刺激了跨国公司的学习过程。在新的环境下，如果先前的解决方案不能有效解决原有问题或新问题的话，那么组织就会产生学习动机（Szulanski,

1996)。当制度环境从稳定过渡到不确定时，原有制度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失效，甚至还可能面临新的制度问题，因此高管就产生了学习制度能力的动机。

根据学习理论，高管的母国制度感知还为其学习制度能力提供了机会。当感知到不确定的制度环境时，为了与制度环境相互保持一致，高管要积极识别潜在的机会或威胁，并据此采取适应、协调或变革制度环境的新行动。尽管高管可能因制度环境过于不确定而采取了不恰当的战略行为，但是试错性学习的结果随后会被整合到自己的流程库里（Autio et al., 2011）。具体而言，与制度互动的成功行为将保留在高管的流程库中并惯例化，而失败的行动将从他们的流程库中废弃。如果制度变化与企业成长的方向和程度不符，那么高管需要开展适应式学习和主动式学习（Cyert & March, 1963）从而导致资源的重新配置（Sapienza et al., 2006）以及制度感知、适应、协调和变革流程的不断更新，进而形成新的制度能力。

高管的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不仅引发其学习过程，还促使他们反思自己对制度流程与预期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及其适用条件的认识。从认知铭记理论（Stinchcombe, 1965）的角度看，暴露在高度不确定的母国制度环境就属于产生铭记效应的重大事件。在不确定的母国制度环境下，高管只有灵活部署并不断更新感知、适应、协调和变革制度环境的流程才能确保企业的生存和成长。于是，他们铭记了这些流程在不确定的制度环境下对企业生存和成长的重要性。Sapienza 等（2006）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早期国际化使企业暴露在不确定的新外国市场

环境中，并使企业铭记了成功的适应能力。所经历的制度不确定性越高，制度能力对高管的铭记效应就越明显。因此，高管不仅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开发与制度环境协同演进的新流程（Rosenbloom, 2000），而且如果后来再遇到高度不确定的制度环境，那么他们仍然会调整或创造新的感知、适应、协调和变革制度环境的流程，从而增强了现有制度能力或构建了新制度能力。

另一方面，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越高，其制度能力越强。从学习理论（Argote, 1999）的角度看，高管所经历的多样化的母国制度环境也为其开发制度能力提供了学习机会。跨国公司的母国是一个关键的情境因素（Teece, 2014），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比如，中国）内部的制度多样性很高。当高管到了一个与先前地方的制度环境迥异的新地方时，为了与该制度环境相互保持一致，他们需要开展适应性学习和创造性学习，并调整或重新开发感知、适应、协调和变革制度环境的流程，因为他们在一个制度环境中拥有的流程可能并不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制度环境（Teece, 2014）。类似地，当高管到了多个制度环境彼此不同的地方，他们会开展学习并针对每个地方开发与制度环境互动的独特流程。正如 Teece（2014）所言，跨国公司的能力部分源自它们运营和竞争所在的多样化环境。因此，在经历了多样化的地方制度环境之后，高管就拥有了多样化的与制度环境协同演进的流程（Autio et al., 2011），自身的制度能力也就得到了提高。

高管所经历的多样化的母国制度环境不仅引发其异质反应和制度流程的创新，而且有助

于他们开发稳健的认知地图。组织成员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形成了个人信念，而此信念会影响他们的行动流程或行动组合；在开展行动之后，环境给予他们一个积极或消极的回应，从而影响他们原先对事物因果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这就形成了一个学习循环（March & Olsen, 1975）。随着高管进入不同制度环境的地方，他们发现自己先前与制度互动的很多信念受到挑战，从而驱使他们去探寻新的认知地图。在经历了多样化的地方制度环境并拥有了多样化的制度流程之后，高管会试图去比较和理解不同制度流程的有效性及其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适用性，从而建立稳健的“简单规则”（Eisenhardt & Sull, 2001）。“简单规则”既包括对什么制度流程起作用的因果关系的理解，又包括对什么制度流程在什么制度情境下起作用的认识。新构建的“简单规则”和高管先前有效的与制度互动的信念组合起来（Prashantham & Floyd, 2012），从而形成新制度能力。

H1: (a) 高管的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和 (b) 多样性经历与 (c) 其制度能力正相关。

## （二）高管制度能力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

Chetty 等（2014）把国际化速度界定为企业国际扩张的平均速度，即国际新创企业自创建以来平均每年的国际化状态。Oviatt 和 McDougall（2005）提出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三个维度：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国家范围速度是指企业所进入的外国市场的数量、心理距离和多样性随时间变化的速度（Casillas & Acedo, 2013; Oviatt & McDougall, 2005）；国际承诺速度是指企业向国际

市场所投入的资源随时间变化的速度（Casillas & Acedo, 2013; Chetty et al., 2014）。在经历母国制度环境之后，高管开发的制度能力包括母国特定的制度能力和一般性的制度能力。特定的制度能力的一个例子是：能够获得所在城市自行制定的商务政策的支持。一般性的制度能力的一个例子是：能够感知各种制度环境给企业带来的机会或威胁。考虑到国内和国外的制度差异，母国特定的制度能力只适用于母国市场，而一般性的制度能力同时适用于国内外市场。从制度能力的定义和量表可以看出，本文界定和测量的是一般性的制度能力。因此，我们认为制度能力会影响国际化速度。

高管制度能力与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高层梯队理论（Hambrick & Mason, 1984）和战略选择观（Child, 1972）进行解释。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管理者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战略选择，并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Hambrick & Mason, 1984）。战略选择观认为企业的战略选择是在仔细权衡自身资源禀赋之后的结果（Child, 1972）。尽管国际新创企业的有形资源往往非常有限，但是这些企业的高管通常拥有很强的商业技能或丰富的经验知识等无形资源（Knight & Kim, 2009）。通过提供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无形资源使快速国际化成为更加可行的战略（Chang & Rhee, 2011）。凭借丰富的与制度互动的流程以及相关的认知地图，制度能力强的高管知道跟谁加强互动来获取充分的外国制度信息和知识，并知道如何阻碍外国制度环境的变革，从而有助于克服外来者劣势和降低制度不确定性（Gao & Pan, 2010），进而做出加快国际扩张步伐的决策。此

外，制度能力强的高管往往能够开发出有效的与制度环境互动的流程，面临更少的制度障碍，因而会显得更加自信，也更倾向于做出快速国际化决策。国际制度环境也具有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所以高管在母国制度环境中所开发的制度能力在东道国情境下同样适用。因此，高管的制度能力越强，新创企业的国际化速度越快。

制度能力越强，初始进入速度越快。制度能力强的高管能够开发出获取制度知识和解读制度信息的惯例和流程。通过把获取制度知识和解读制度信息的活动惯例化和流程化，他们在执行此类活动时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Cyert & March, 1963)。换句话说，通过执行相关的制度惯例和流程，高管既可以迅速获取和解读国际制度环境的信息，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组织与国际制度环境相互保持一致，从而能够快速识别和利用国际制度机会，进而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就进入国际市场 (黄胜和周劲波, 2013)；又能够获取一种新颖的、独特的国际制度信息或知识组合，这种组合使得他们在理解和认识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影响方面具有优势 (Eriksson et al., 1997; Perkins, 2014)，从而降低了他们对外国市场风险的感知并且增加了他们感知国际商业机会的准确性和现实性，进而高效和有效地做出首次国际化活动的决策。

制度能力越强，国家范围速度越快。正如前面所言，拥有制度能力的高管能够开发出获取制度信息和制度知识的惯例和流程。在执行这些惯例和流程之后，他们拓展了自身的制度知识结构，同时获取了多个东道国的不同制度信息。当这些制度知识和制度信息相结合时，

他们就能识别制度差异性和多样性所带来的套利机会 (Jackson & Deeg, 2008)。为了利用套利机会，制度能力强的高管会决定迅速进入多个制度距离较远的东道国。此外，制度能力强的高管还能够开发出协调不同制度压力的惯例和流程。通过执行这些惯例和流程，他们不仅能高效和有效地协调多样化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东道国制度压力，还能将财务资源在制度环境不同的东道国进行精明配置。根据资源基础观，这种资源配置会产生独特的新资源结构，并给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 (Eisenhardt & Martin, 2000)。因此，为了获取国际竞争优势，制度能力强的高管会决定迅速扩大外国市场组合。

制度能力越强，国际承诺速度越快。制度能力不仅为高管减少了制度缺失性所带来的交易费用和制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还为他们获得了合法性及其给国际新创企业所带来的有形资源 (Bangara et al., 2012)。根据资源基础观，有形资源起到组织冗余的作用，而组织冗余使得快速国际化成为一种可行战略 (Chang & Rhee, 2011)。组织冗余意味着组织拥有超过生存所需的资源 (Cyert & March, 1963)。少量冗余资源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谨慎的行为 (Baker et al., 2003)，而大量冗余资源的企业更愿意承担风险 (Singh, 1986)。由于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资源到国际化活动中是一项非常冒险的战略，因此具有冗余资源的国际新创企业更愿意采用此战略。周劲波等 (2014) 的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在初始进入阶段正式合法性越高，国际新创企业越能加快进入后阶段的模式演进速度。如果高管缺乏制度能力，那么他们往往会感知到更大的制度不

确定性。为了把制度风险降到最小，他们通常选择低资源承诺的模式进入心理或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 (Eriksson et al., 1997)。

H2: 高管的制度能力与新创企业的 (a) 初始进入速度、(b) 国家范围速度和 (c) 国际承诺速度正相关。

### (三) 制度能力的中介效应

根据假设一和假设二，高管的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和多样性经历通过其制度能力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起间接作用。Kiss 和 Danis (2008) 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们认为母国制度发展水平通过影响创业者社会网络的构成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产生间接影响。根据假设二，高管制度能力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起直接作用。因此，高管制度能力在其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和多样性经历与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具有桥梁功能。能力因素在其他驱动因素与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得到了一些文献的支持。又如，Prashantham 和 Young (2011) 在探讨社会资本对新创企业进入后速度的影响时，以吸收能力为中介。高管所经历的母国制度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有助于其制度能力的开发，而制度能力的应用则有助于加快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换言之，高管的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和多样性经历越高，其制度能力越强，新创企业的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越快。

H3: 高管制度能力在其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与 (a) 初始进入速度、(b) 国家范围速度和 (c) 国际承诺速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H4: 高管制度能力在其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与 (a) 初始进入速度、(b) 国家范围速度

和 (c) 国际承诺速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 (四) 国际化导向对制度能力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国际化导向是指高管为实现在国际市场的目标而采取积极主动和有远见的行为的倾向 (Dichtl et al., 1990; Knight & Kim, 2009)。高国际化导向的高管推动企业国际化成长意愿非常强烈 (Nummela et al., 2004)。国际化导向对制度能力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可以用企业行为理论 (Cyert & March, 1963) 来解释。Cyert 和 March (1963) 认为决策者的经历、偏好、背景和特质对战略决策过程的各个环节 (比如，信息获取、信息解读和方案选择) 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高管的国际化导向有助于他们开发独特的国际商务能力 (Knight & Kim, 2009)，而这种能力与制度能力之间具有互补性，因而增强了制度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

国际化导向越强，制度能力对初始进入速度的促进作用越大。拥有制度能力的高管通过开发和利用“制度信息的获取和解读流程”从而影响新创企业的初始进入速度。一方面，如果高管还具有强烈的国际化导向，那么他们在使用“制度信息的获取流程”时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先动性 (Acedo & Jones, 2007)，从而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就能获取国际制度环境的信息并快速识别国际制度机会 (Knight & Kim, 2009)，进而加快新创企业的初始进入速度以利用这个机会；另一方面，如果高管还具有强烈的国际化导向，那么他们在使用“制度信息的解读流程”时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远见性 (Acedo & Jones, 2007)，从而能提高解读国际制度信息的

效率和效果并快速识别国际制度机会 (Knight & Kim, 2009), 进而加快新创企业的初始进入速度以利用这个机会。可见, 国际化导向增强了制度能力对初始进入速度的正向影响。

国际化导向越强, 制度能力对国家范围速度的促进作用越大。拥有制度能力的高管通过开发和利用“制度信息的获取和解读流程”以及把财务资源精明地配置在制度环境不同的东道国从而影响新创企业的国家范围速度; 如果高管还具有强烈的国际化导向, 那么他们往往具有全球视野并倾向于把世界而不只是母国看作是企业的市场 (Nummela et al., 2004; Knight & Kim, 2009), 并能在短时间内通过使用“制度信息的获取流程”收集多个东道国的不同制度信息, 从而在特定时期内识别更多的多样化制度套利机会, 进而加快新创企业的国家范围速度以利用这些机会; 此外, 如果高管还具有强烈的国际化导向, 那么他们会做出将有形资源在制度环境不同的多个东道国进行迅速分配的决策, 从而加快新创企业的国家范围速度。可见, 国际化导向增强了制度能力对国

家范围速度的正向影响。

国际化导向越强, 制度能力对国际承诺速度的促进作用越大。拥有制度能力的高管通过降低制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和获取合法性所带来的资源供给从而影响新创企业的国际承诺速度。一方面, 如果高管还具有强烈的国际化导向, 那么他们通过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能迅速获得大量国际制度信息, 从而表现出更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知 (Acedo & Jones, 2007; Piaskowska & Trojanowski, 2014), 进而做出在短时间内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外国市场的冒险决策, 即加快新创企业的国际承诺速度; 另一方面, 如果高管还具有强烈的国际化导向, 那么他们非常重视国际化活动 (Nummela et al., 2004), 从而倾向于做出把合法性所带来的大量资源快速投入到外国市场的决策, 进而加快新创企业的国家承诺速度。可见, 国际化导向增强了制度能力对国际承诺速度的正向影响。

H5: 国际化导向正向调节制度能力与 (a) 初始进入速度、(b) 国家范围速度和 (c) 国际承诺速度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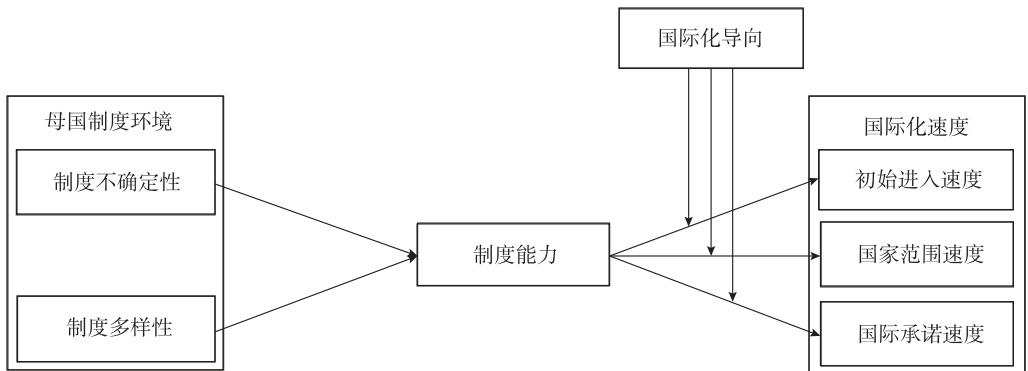


图 1 母国制度环境与国际化速度：制度能力和国际化导向的作用

注：制度不确定性是高管对母国制度不确定性的感知，制度多样性是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国际化速度可以理解为高管做出的国际化决策，因此模型中所有变量都可以操作化到个体层面进行测量。

### 三、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收集和样本描述

基于发达国家样本的相关研究通常用“成立最初的6年内海外销售额比例大于20%”的标准来识别国际新创企业(杨忠等, 2007)。然而, 新创企业的国际化速度、深度和广度三个核心特征是情境敏感的(Cesinger et al., 2012)。考虑到本研究是在中国制度转型背景下开展的<sup>①</sup>, 并在参照国际顶级期刊的文章(Lu et al., 2010)的做法之后, 本研究决定采用如下标准来筛选国际新创企业: ①具有独立经营权的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②年龄在10年以下的新创企业。由于中国的国内市场巨大, 我国大部分企业在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通过国内经营就能谋得生存和成长, 不一定很早就开展国际化活动。同时, 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 新创企业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 此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流程等才趋于稳定、成熟, 因此本文采取10年的做法来筛选新创企业。③海外销售比例不低于10%的国际企业。跟北欧国家和新加坡等内部市场狭小的国家不同, 中国的内部市场巨大, 中国企业可以获得很高的国内销售额。在海外销售额相同的情况下, 中国企业的海外销售比例就可能比内部市场狭小的国家低。

由于新兴经济体国际新创企业的公开数据

往往是稀缺的、过时的或不准确的(Khavul et al., 2010), 因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sup>②</sup>。首先, 在国内选取8个有代表性的省份。根据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 我们选取了两个制度发展水平较高且制度变化较快的省份(广东和浙江)、三个中等的省份(湖南、湖北和四川)以及三个较低的省区(广西、云南和海南)。其次, 从康帕斯数据库中随机抽取广东和浙江的国际新创企业各225个, 其他省份各150个。最后, 根据康帕斯数据库中提供的联系电话, 几经周折后才与总经理或负责国际业务的高管取得联系, 并向同意参与调研的总经理或负责国际业务的高管快递、传真、上门递送纸质版问卷或发送电子版问卷进行调查。

我们联系了1350家国际新创企业, 回收了361份问卷, 回收率为27%。在剔除基层员工为填答人或国际化程度低于10%等不合格问卷之后, 有效问卷为349份。我们用企业年龄和员工人数这两个指标进行无反应偏差检验以及早期与后期反应偏差检验, 并发现对应指标之间的差异不显著。样本的基本信息如下: 高管为男性的314人(占90%)、女性35人(占10%); 年龄在30岁以下的56人(占16%)、30~39岁188人(占54%)、40~49岁98人(占28%)、50岁及以上7人占(2%); 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52人(占15%)、专科和本科262人(占75%)、研究生35人(占10%);

<sup>①</sup> Cesinger等(2012)的研究发现: 由于情境差异, 与来自美国的实证研究相比, 来自欧洲的研究把国际新创企业界定为国际化时间更接近成立日期(速度)、外国收入比例更高(深度)、进入更多心理距离更远外国市场(广度)的企业。据此, 我们认为放宽中国情境下国际新创企业的选取标准是合理的。

<sup>②</sup> 由于量表来自英文文献, 所以我们采取回译的方式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在正式调研之前, 我们选择了10位国际新创企业的高管进行预测试。根据预调研的结果, 作者对问卷的文字表达、题项顺序和页面排版进行优化。

企业员工数量在 10 人及以下的 4 个（占 1%）、11~50 人 73 个（占 21%）、51~100 人 101 个（占 29%）、101~250 人 94 个（占 27%）、251~500 人 52 个（占 15%）、500 人以上 25 个（占 7%）；行业类型为制造业的 290 个（占 83%）、服务业 59 个（占 17%）；产业类型为劳动密集型的 213 个（占 61%）、技术密集型 136 个（占 39%）；企业年龄 1~3 年 21 个（占 6%）、4~6 年 154 个（占 44%）、7~10 年 174 个（占 50%）；国际化程度在 10%~25% 的 115 个（占 33%）、26%~75% 的 143 个（占 41%）、75% 以上的 91 个（占 26%）；地区在广东的 56 个（占 16%）、浙江 64 个（占 18%）、湖南 42 个（占 12%）、湖北 35 个（占 10%）、四川 31 个（占 9%）、广西 52 个（占 15%）、云南 31 个（占 9%）、海南 38 个（占 11%）。

## （二）变量测量

### 1. 自变量

制度不确定性感知量表来自 Meyer 和 Estrin (2007) 的研究。该量表有四个题项，采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李克特五点量表。一条示例题项为“定期获取法规变化信息的重要性”。制度多样性经历的测量主要借鉴 Banalieva 和 Dhanaraj (2013) 以及宋渊洋和李元旭 (2013) 的研究。度量步骤如下：其一，要求高管在问卷中勾选其在管理本企业之前生活、学习和工作过并且对当地制度环境熟悉的所有省份；其二，找出这些省份所对应的市场

化总指数；其三，使用变异系数和标准差公式计算制度多样性。其中，标准差用于稳健性测试<sup>①</sup>。

### 2. 中介变量

基于扎根理论分析所开发的制度能力多维构思，本文成功开发出了二阶的制度能力量表（具体过程请见“附录 1”）。这个量表包含制度能力 5 个维度所对应的 19 条题项。制度感知能力的测量题项是：我能获取充分的关于制度环境的信息；认识到制度环境的发展变化趋势；积极利用先前的工作经验来解读制度环境信息；感知到制度环境给企业带来的机会或威胁。制度适应能力的测量题项是：我能根据当前的制度环境灵活调整企业的目标；根据当前的制度环境灵活调整企业的经营方法；根据当前的制度环境灵活调整企业的产出；使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都符合当前的制度环境。制度协调能力的测量题项是：我能平衡不一致的地方制度环境或政府部门政策对企业的不同影响；调和不一致的中央与地方政策法规对企业的不同影响；处理好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与合乎制度规定之间的关系。制度变革能力的测量题项是：我们根据企业利益阻碍制度环境的变革；建立一套新的技术标准或商业模式；使自创的技术标准或商业模式被社会认可；使新的技术标准或商业模式满足企业利益。制度更新能力的测量题项是：我能学习他人 在处理与制度环境关系方面

<sup>①</sup> 假定高管在管理国际新创企业之前生活、学习和工作过并且对当地制度环境熟悉的省份有  $n$  个，第  $i$  个省份所对应的市场化总指数为  $V_i$ ，这  $n$  个省份所对应的市场化总指数的均值为  $\bar{V}$ ，则高管所经历的母国制度多样性可以用下面两个公式来计算：

一是标准差公式，即  $\sigma = \sqrt{\frac{1}{n-1} \sum_{i=1}^n (V_i - \bar{V})^2}$ ；二是变异系数公式，即  $CV = \frac{\sigma}{\bar{V}}$ 。

的经验；总结自己在处理与制度环境关系方面的经验；招到在处理与制度环境关系方面有经验的人才；使企业在制度环境演化的各个阶段始终与其相互保持一致。

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在制度能力的二阶模型（如图 2 所示）中每条题项在其对应的因

素“制度适应能力”“制度协调能力”“制度变革能力”和“制度更新能力”的标准化载荷为 0.63~0.81，并且“制度感知能力”“制度适应能力”“制度协调能力”“制度变革能力”和“制度更新能力”在二阶因素“制度能力”的标准化载荷为 0.79~0.91。根据统计经验法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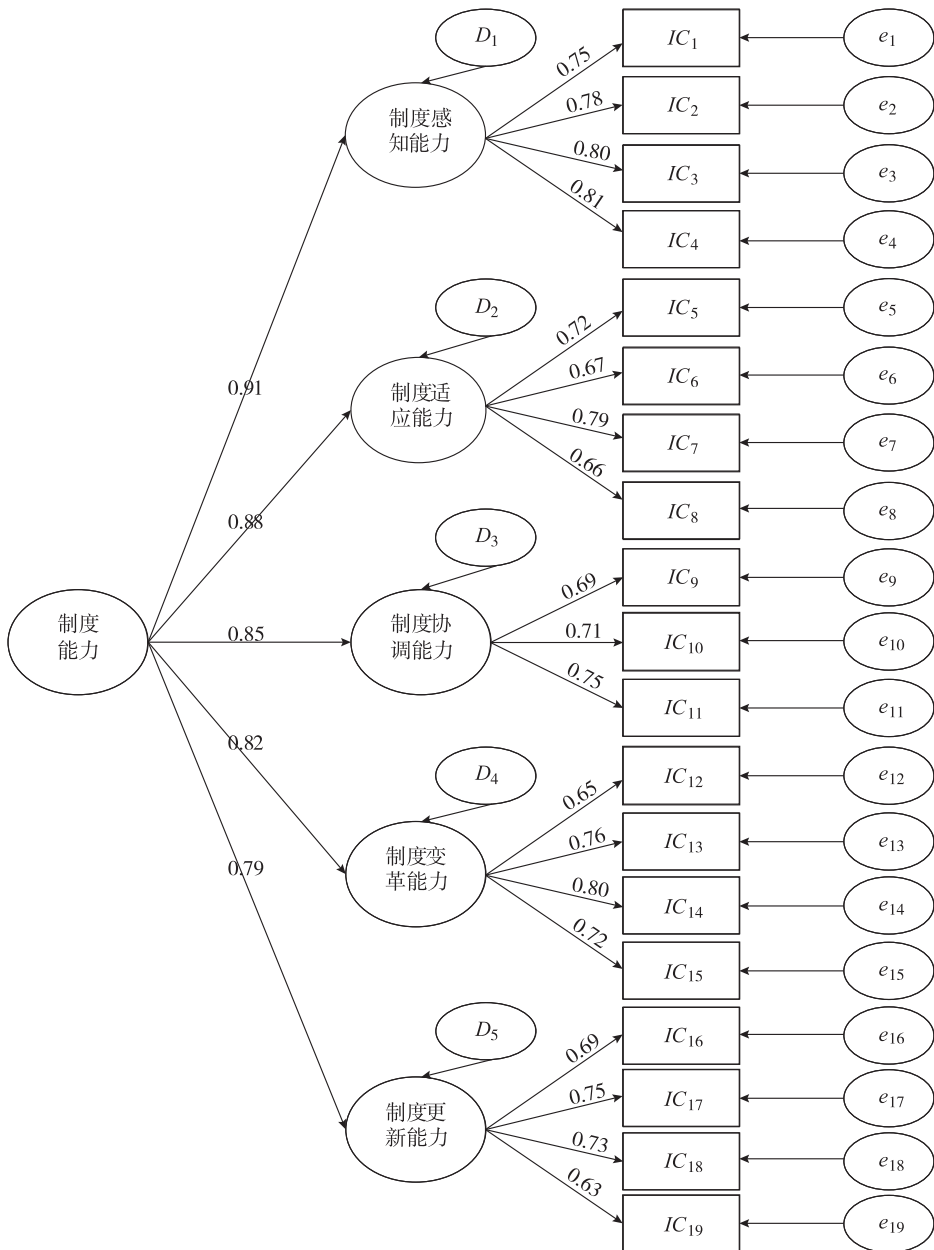


图 2 制度能力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五因素二阶结构 (N=346)

(Anderson & Gerbing, 1988; Fornell & Larcker, 1981), 制度能力的二阶模型的基本适配度比较理想。此外, 制度能力的二阶模型与样本数据的各项拟合指标 ( $\chi^2/df = 2.07$ ; RMSEA = 0.047; CFI = 0.92) 均良好。因此, 本文采用二阶模型来计算制度能力的得分, 即先根据 19 条测量题项的分数, 计算出 5 个一阶因素的得分, 然后再根据 5 个一阶因素的分数, 计算出二阶因素制度能力的得分。

### 3. 调节变量

国际化导向的量表改编自 Knight 和 Kim (2009) 的研究。该量表由 4 条题项构成, 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的李克特五点量表。一条示例题项为“倾向于把世界而不只是中国看作是企业市场”。

### 4. 因变量

初始进入速度的测量指标来自 Autio 等 (2000) 以及 Oviatt 和 McDougall (2005) 的研究。他们通过计算首次进军外国市场的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间的时间差来度量初始进入速度。时间差越短, 初始进入速度越快, 因此初始进入速度需要反向编码。国家范围速度的测量指标主要借鉴 Oviatt 和 McDougall (2005) 以及 Casillas 和 Acedo (2013) 的研究。度量步骤如下: 第一, 要求高管在问卷中勾选目前企业业务所涉及的所有国家。第二, 把这些国家归入 Ronen 和 Shenkar (2013) 所划分的 11 个文化群, 并统计第  $i$  个文化群的国家数量  $C_i$  ( $i = 1 \sim 11$ )。第三, 根据各个文化群与中国所在的“儒家群”之间的差异, 确定第  $i$  个文化群的序数  $O_i$  (Barkema et al., 1996)。“儒家群”的序数是 1, “拉丁美洲群”的序数是 11, 其他文化

群介于 1 和 11 之间。第四, 第  $i$  个文化群的序数乘以相应的国家数量并求和  $\sum O_i C_i$  ( $i = 1 \sim 11$ ), 即国际化广度。第五, 把国际化广度除以自企业首次外国扩张以来的年数, 并求对数。这种测量方法同时反映了国家范围变化的数量和质量。国际承诺速度的测量指标主要借鉴《世界投资报告 2000》所提出的跨国指数计算方法。度量步骤如下: 首先, 要求高管在问卷中填写目前企业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海外雇员占总雇员数和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 其次, 计算这三者的算术平均数; 最后, 把算术平均数除以自企业首次外国扩张以来的年数。

### 5. 控制变量

由于样本企业来自同一个国家 (中国) 并且国家范围速度包含了东道国国家层面的因素, 因此本研究仅考虑亚国家及以下层面的 11 个对制度能力和国际化速度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 在个体层面, 高管的年龄越大, 其阅历越丰富。阅历对制度能力和国际化速度具有重要影响 (Barkema & Shvyrkov, 2007)。它操作化为高管实际年龄的对数。国际化经验丰富的高管通常拥有丰富且精确的关于外国环境的认知地图, 这有助于企业加快国际化速度 (Barkema & Shvyrkov, 2007)。它操作化为高管在其职业生涯中从事企业国际化活动的年数。教育程度高的高管往往对外国环境有比较深刻的见解, 这同样能推动新创企业的快速国际化。它为虚拟变量, 取值 0 表示高中及以下学历, 取值 1 表示大学及以上学历。男性高管通常会做出更加快速和冒险的国际化速度决策, 而女性高管则更加犹豫和谨慎。性别为虚拟变量, 取值 0 表示女性, 取值 1 表示男性。

在组织层面，企业规模代表的是资源禀赋，它对制度能力和国际化速度具有重要影响（Fuentesláz et al.，2002）。它用员工总数的对数进行测量。根据新创企业的学习优势观，企业年龄与国际化速度之间是负相关关系（Autio et al.，2000；Sapienza et al.，2006）。它用调查年份和成立年份之差的绝对值进行计算。高科技和高强度的研发活动通常被认为是企业国际化的重要驱动因素（Shrader，2001）。通过询问被调查者企业研发活动的频率——“从不、偶尔和经常”来测量研发密集度。

在行业层面，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新创企业为了分摊研发成本往往采取早期快速国际化战略（Oviatt & McDougall，1994），因此本研究使用虚拟变量行业类型 I 来区分知识密集型行业（编码为 1）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编码为 0）。大量证据表明服务业企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存在很大差异（Rialp et al.，2005），因此本研究引入虚拟变量行业类型 II 来区分服务业（编码为 1）和制造业（编码为 0）。

在亚国家层面，如果公司总部所在省份的制度环境是有利的，那么它将促进新创企业国际化；反之，新创企业为了逃避不利环境的影响也会采取快速国际化战略（Arregle et al.，2016；Luo et al.，2010；Witt & Lewin，2008；Yamakawa et al.，2008），因此本研究用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来测量省份制度环境。

### （三）数据分析方法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和自助法的逐步法（Preacher & Hayes，2008；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用于检验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潜调节结构方程法用于检验潜变量调节效应（Kelava et

al.，2011）。本研究使用 Mplus 7.0 软件检验上述研究假设，同时将自助法的重复抽样设定为 5000 次。

## 四、研究结果

### （一）描述性统计

从相关系数表（如附录 2 所示）可以看出，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与制度能力正相关（ $r = 0.24, p < 0.01$ ）；制度能力与新创企业的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显著正相关（ $r = 0.19, p < 0.01$ ； $r = 0.22, p < 0.01$ ； $r = 0.23, p < 0.01$ ）。国际化经验（ $r = 0.12, p < 0.05$ ）丰富、企业规模（ $r = 0.11, p < 0.05$ ）和年龄（ $r = 0.11, p < 0.05$ ）较大以及经常开展研发活动（ $r = 0.10, p < 0.05$ ）的国际新创企业的高管制度能力较强。拥有丰富国际化经验（ $r = 0.27, p < 0.001$ ）和较高教育水平（ $r = 0.14, p < 0.05$ ）的高管、经常开展研发活动（ $r = 0.28, p < 0.001$ ）以及来自知识密集型行业（ $r = 0.14, p < 0.05$ ）和制造业（ $r = 0.11, p < 0.05$ ）的国际新创企业的初始进入速度较快。拥有丰富国际化经验（ $r = 0.32, p < 0.001$ ）和较高教育水平（ $r = 0.19, p < 0.01$ ）的高管、经常开展研发活动（ $r = 0.25, p < 0.01$ ）以及来自知识密集型行业（ $r = 0.11, p < 0.05$ ）的新创企业的国家范围速度较快。拥有丰富国际化经验（ $r = 0.29, p < 0.001$ ）的高管、企业规模（ $r = 0.12, p < 0.05$ ）和年龄（ $r = 0.12, p < 0.05$ ）较大、经常开展研发活动（ $r = 0.30, p < 0.001$ ）以及来自知识密集型行业（ $r = 0.18, p < 0.01$ ）和服务业（ $r = 0.38, p < 0.001$ ）的新创企业的国际承诺速

度较快。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38 以下，这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VIF 值均小于 3，这也说明多重共线性对系数估计的影响不大。

## （二）构念的信度和效度

如表 2 所示，三个潜因子的 Chronbach's  $\alpha$  值均大于 0.70，并且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这说明三个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构念效度。三个潜因子的 CR 值都高于 0.70，这说明整体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各因子的 AVE 值均大于 0.50，这说明整体量表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此外，各个

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负荷较大（均大于 0.55）且显著（t 值都大于 10），这进一步说明整体量表的聚合效度较高。为了验证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制度能力和国际化导向三个因子的区分效度，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竞争模型策略。从表 2 可以看出，三因子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并且优于二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这说明三个因子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另外，三个潜因子的 AVE 的平方根在 0.73 与 0.78 之间，均大于其对应的横向和纵向的相关系数，这也说明整体量表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潜因子/模型	$\chi^2$	$df$	$\chi^2/df$	RMSEA	CFI	$\alpha$ 值	CR	AVE
制度不确定性感知	4.30	2	2.15	0.055	0.91	0.82	0.84	0.54
制度能力	304.29	147	2.07	0.047	0.92	0.85	0.86	0.57
国际化导向	3.94	2	1.97	0.032	0.94	0.89	0.89	0.61
三因子模型	808.96	316	2.56	0.063	0.90	—	—	—
二因子模型	939.93	323	2.91	0.082	0.82	—	—	—
单因子模型	1088.64	324	3.46	0.099	0.77	—	—	—

注：三因子模型包含“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制度能力”和“国际化导向”；在三个因子中把两两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强（如附录 2 所示）的两个因子进行组合，二因子模型包含“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制度能力”和“国际化导向”；单因子模型包含“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制度能力+国际化导向”。

##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减少潜在共同方法偏差，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其一，选用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并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和国际化导向量表。其二，使用过滤问题从心理上分开问卷中预测变量和效标变量的测量。过滤问题包括三组表面上相关的题项并放置在问卷中以隔开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和多样性经历、制度能力、国际化导向和国际化速度的题项。其三，

采用问卷调查和文档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取有关制度多样性经历和国际化速度的数据。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单一因子的最大方差解释率为 25.86%，并未解释大部分方差。因此，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较小。

## （四）假设检验

1. 母国制度环境、制度能力与国际化速度关系的检验

第一步，无中介模型（控制变量、母国制

度环境→国际化速度)的拟合结果是  $\chi^2 = 310.31$ ,  $df = 143$ ,  $\chi^2/df = 2.17$ ,  $RMSEA = 0.054$ ,  $CFI = 0.91$ , 这说明该模型与样本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理想<sup>①</sup>。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对初始进入速度 ( $\beta = 0.05$ ,  $p > 0.05$ )、国家范围速度 ( $\beta = 0.02$ ,  $p > 0.05$ ) 和国际承诺速度 ( $\beta = 0.03$ ,  $p > 0.05$ ) 的总效应均不显著, 这说明探讨“高管的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为什么不以线性方式影响国际化速度”(遮掩效应)是合乎逻辑的。然而, 制度多样性经历对初始进入速度 ( $\beta = 0.20$ ,  $p < 0.01$ )、国家范围速度 ( $\beta = 0.32$ ,  $p < 0.001$ ) 和国际承诺速度 ( $\beta = 0.26$ ,  $p < 0.01$ ) 的总效应均显著, 这说明探讨“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如何影响国际化速度”(中介效应)是符合逻辑的。

第二步, 部分中介模型(控制变量、母国制度环境→制度能力, 控制变量、母国制度环境、制度能力→国际化速度)的拟合结果是

$\chi^2 = 1555.75$ ,  $df = 635$ ,  $\chi^2/df = 2.45$ ,  $RMSEA = 0.059$ ,  $CFI = 0.90$ , 这说明该模型与样本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理想。如表 3 所示, 高管的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对制度能力的影响不显著 ( $\beta = 0.07$ ,  $p > 0.05$ ), 因此 H1 (a) 未得到支持。然而, 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对制度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beta = 0.28$ ,  $p < 0.001$ ), 因此 H1 (b) 得到支持。制度能力与初始进入速度 ( $\beta = 0.20$ ,  $p < 0.01$ )、国家范围速度 ( $\beta = 0.25$ ,  $p < 0.01$ ) 和国际承诺速度 ( $\beta = 0.28$ ,  $p < 0.001$ ) 显著正相关, 因此 H2 (a) ~ H2 (c) 得到支持。由于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与制度能力以及制度能力与国际化速度的路径系数均显著, 因此制度能力在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与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即 H4 (a) ~ H4 (c) 得到支持。

第三步, 如表 4 所示, 制度不确定性感知与

表 3 部分中介模型的路径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作用路径	路径系数	P 值	是否支持假设
H1 (a)	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制度能力	0.07	0.090	否
H1 (b)	制度多样性经历→制度能力	0.28	0.000	是
H2 (a)	制度能力→初始进入速度	0.20	0.007	是
H2 (b)	制度能力→国家范围速度	0.25	0.003	是
H2 (c)	制度能力→国际承诺速度	0.28	0.000	是

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之间的三条间接效应的 95% 的置信区间(分别是  $-0.04 \sim 0.02$ ,  $-0.02 \sim 0.05$  和  $-0.01 \sim 0.06$ )

均包含 0, 这说明制度能力的遮掩效应不显著。因此, 高管制度能力没有在其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与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

<sup>①</sup> 由于本研究的初始模型(无中介模型和部分中介模型)是混合结构方程模型, 因此拟合指数较好。尽管 Mplus 报告的修正指数有些超过 4.0, 但是初始模型拟合理想, 所以我们不执行“模型修正”这一步骤。

承诺速度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即 H3 (a) ~ H3 (c) 未得到支持。制度多样性经历与国际化速度三个维度之间的三条间接效应的 95% 的置信区间（分别是 -0.11 ~ -0.02, 0.02 ~ 0.12 和 0.03 ~ 0.13）均不包含 0，这也说明高管制度能力在其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与国际化速度三个维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第四步，在上述部分中介模型中，制度多样性经历对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的直接效应均显著 ( $\beta = 0.14, p < 0.05$ ;  $\beta = 0.25, p < 0.01$ ;  $\beta = 0.18, p < 0.01$ )，这初步说明高管制度能力在其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与国际化速度三个维度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第五步，制度能力在制度多样性经历与初始

表 4 间接效应显著性的自助法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间接效应	估计值	P 值	95%的置信区间		是否支持假设
				下限	上限	
H3 (a)	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制度能力→初始进入速度	0.01	0.135	-0.04	0.02	否
H3 (b)	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制度能力→国家范围速度	0.02	0.109	-0.02	0.05	否
H3 (c)	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制度能力→国际承诺速度	0.02	0.105	-0.01	0.06	否
H4 (a)	制度多样性经历→制度能力→初始进入速度	0.06	0.040	-0.11	-0.02	是
H4 (b)	制度多样性经历→制度能力→国家范围速度	0.07	0.023	0.02	0.12	是
H4 (c)	制度多样性经历→制度能力→国际承诺速度	0.08	0.015	0.03	0.13	是

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符号 (+, +, +) 与部分中介模型中制度多样性经历对国际化速度三个维度的直接效应符号 (+, +, +) 相同，这进一步说明高管制度能力在其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与国际化速度三个维度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制度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30.00%、21.88% 和 30.77%。

并且当制度能力和国际化导向的交互项加入结构方程时，该交互项对初始国际化速度 ( $\beta = 0.13, p < 0.05$ )、国家范围速度 ( $\beta = 0.11, p < 0.05$ ) 和国际承诺速度 ( $\beta = 0.15, p < 0.05$ ) 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从图 3 可以看出，与低国际化导向的高管相比，高国际化导向的高管的制度能力对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国际化导向对制度能力与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 H5 (a) ~ H5 (c) 得到支持。

2. 国际化导向在制度能力与国际化速度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如表 5 所示，在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表 5 基于潜调节结构方程法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初始进入速度		国家范围速度		国际承诺速度	
	路径系数	P 值	路径系数	P 值	路径系数	P 值
高管年龄	-0.04	0.111	0.02	0.139	0.07	0.073

续表

	初始进入速度		国家范围速度		国际承诺速度	
	路径系数	P 值	路径系数	P 值	路径系数	P 值
高管国际化经验	0.33	0.000	0.31	0.000	0.25	0.003
教育程度	0.06	0.080	0.09	0.055	-0.04	0.111
性别	0.01	0.153	0.03	0.125	0.06	0.081
企业规模	-0.11	0.035	0.01	0.161	0.12	0.031
企业年龄	-0.02	0.135	0.03	0.130	0.11	0.037
偶尔研发	0.07	0.074	0.09	0.057	0.05	0.092
经常研发	0.28	0.000	0.17	0.010	0.23	0.005
行业类型 I	0.10	0.041	0.13	0.024	0.09	0.059
行业类型 II	-0.02	0.135	-0.03	0.127	0.20	0.008
省级制度环境	0.01	0.162	0.01	0.160	0.02	0.143
制度能力	0.21	0.007	0.24	0.004	0.27	0.000
国际化导向	0.24	0.004	0.14	0.020	0.25	0.003
制度能力×国际化导向	0.13	0.025	0.11	0.038	0.15	0.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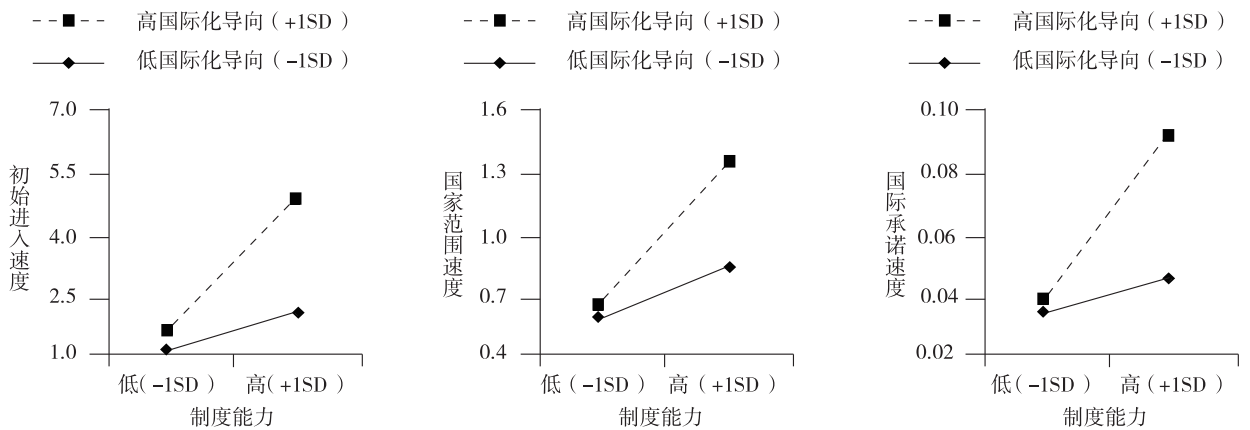


图3 国际化导向对制度能力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注：-1SD表示均值减一个标准差，+1SD表示均值加一个标准差。

### 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两种方法来削弱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一，为了减弱因遗漏变量而带来的潜在内生性的影响，本文在横截面模型中加入了尽可能多的控制变量（共计11个）。为了侦查是否遗漏了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的平方项这一变

量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三个维度的影响，本文采用回归设定误差检验。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二次方的F统计值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065、0.082和0.068（均大于0.05），这说明回归模型没有遗漏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的平方项。第二，在问卷中采用时间滞后性方法来削

弱互为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例如，在管理本企业之前（时间 1）您生活、学习和工作过并且对当地制度环境熟悉的省份有哪些（测量制度多样性经历的第一个步骤）？请您回顾一下企业刚刚成立时（时间 2）的情形，并对当时自己的制度能力进行评估……此外，本研究的证据不支持逆向因果关系：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通过高管制度能力影响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新创企业快速进入多个不同的东道国（样本中东道国数量的均值为 20.45）市场有助于高管通过学习开发制度能力。由于国内不同省份间的制度差异小于不同国家间的制度差异，而且高管已经拥有强大的制度能力，他们理应经历更多不同省份的制度环境。然而，样本中高管所经历的省份数量的均值为 6.02，小于新创企业所进入的东道国数量的均值。

稳健性检验的步骤如下：首先，采用标准差公式计算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得到类似的研究结果。其次，采用“外国销售额占比达到 10% 的年份减去企业成立的年份”作为初始进入速度的测量指标（Prashantham & Young, 2011），“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除以自企业首次外国扩张以来的年数”作为国际承诺速度的测量指标，得到一致的研究结果。最后，同时将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初始进入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设置为上述计算方法或测量指标，得到的研究结果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有较强的稳健性。

## 五、讨论和结论

高管的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对提升其制

度能力的作用不明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高管的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对其学习产生了不利影响。当不确定性很高时，管理者在做出决策方面会变得犹豫和拖延（Milliken, 1987）。在高度不确定的母国制度环境中，高管无所适从，没有果断、迅速采取与制度环境互动的新行动，因而未能通过“干中学”有效开发制度能力。与母国制度不确定性感知不同，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对学习具有积极影响。在多样化的母国制度环境中，高管可以接触到新的、不同的观点，并通过与不同的制度环境进行互动来学习，因而能够有效开发制度能力。类似的观点在国际新创企业研究领域也存在，例如，Zahra 等（2000）认为新创企业的国际多样性与其技术知识正相关。

### （一）理论贡献

本文主要对新创企业国际化文献做出贡献。Keupp 和 Gassmann（2009）呼吁未来研究需要整合多个理论视角来构建能系统、全面解释新创企业快速国际化现象的理论模型。本文通过整合制度基础观、动态管理者能力理论和战略导向观等理论视角，对不同新创企业之间的国际化速度差异提供了新解释，从而回应了这一呼吁。具体而言：

其一，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通过制度能力对新创企业的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这不仅丰富了制度基础观视角下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而且深化了我们对母国制度环境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内在机制的认识。现有相关研究（Kiss & Danis, 2008, 2010）只关注母国制度缺失性对国际化速度这

个整体概念的影响，而本文则通过引入两个新制度特性——母国制度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以及深入到国际化速度的维度层面，发现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三个维度产生了间接正向影响。与 Kiss 和 Danis (2008, 2010)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高管能力的角度切入，并揭示了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一条新机制——制度能力的中介作用。

其二，国际化导向对制度能力与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起权变作用，这发展了我们对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通过其制度能力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边界条件的认识。尽管先前研究 (Acedo & Jones, 2007; Weerawardena et al., 2007) 和本研究都认为国际化导向对初始进入速度具有重要影响，但先前研究仅理论分析了国际化导向对初始进入速度的间接效应，而本研究则实证检验了它的调节效应：通过与制度能力发生交互，国际化导向不仅对初始进入速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进入后速度具有重要影响。现有文献 (Kiss & Danis, 2008, 2010) 尚未识别母国制度环境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权变因素，而本研究则揭示了高管所经历的母国制度多样性通过制度能力间接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边界条件——国际化导向的调节作用。

其三，中国制度环境特征——制度多样性和高管的特质——制度能力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具有重要影响。这丰富了新兴经济体新创企业国际化研究。目前大部分新创企业国际化研究都是在发达国家开展的 (Kiss et al., 2012)，而本文则采用新兴经济体——中国的样

本数据。先前文献 (黄胜等, 2015; Kiss & Danis, 2010) 认为母国制度缺失性是新兴经济体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因素，而本文则发现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也是新兴经济体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驱动因素。个体能力视角下的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虽然已经识别出了机会识别和设定能力 (Oviatt & McDougall, 2005)、创业导向能力 (Weerawardena et al., 2007) 和认知能力 (Acedo & Jones, 2007) 等驱动因素，但是对新兴经济体企业高管独特能力因素的挖掘不够丰富。本文正是基于中国相对特别的制度情境——制度多样性，发现高管相对特别的能力——制度能力也是中国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重要驱动因素。

此外，本文对动态管理者能力 (Adner & Helfat, 2003; Helfat & Martin, 2015) 文献做出贡献。制度能力是动态管理者能力的一种具体类型。一方面，本文提炼出制度能力的概念和维度，并为其开发量表。Perkmann 和 Spicer (2007) 未对制度能力进行严格定义，项国鹏等 (2009) 把制度能力理解为制度创新能力，而本文则试图对制度能力做出更加明确、全面的界定，并把它定义为高管持续不断地与制度环境进行互动从而促进企业出现和成长的能力。先前研究 (Perkmann & Spicer, 2007; 项国鹏等, 2009) 认为制度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本文支持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发现它由制度感知、适应、协调、变革和更新能力五个维度构成。除了涵盖先前研究 (Perkmann & Spicer, 2007; 项国鹏等, 2009) 所提出的制度能力的所有维度外，我们的理论性编码还发现了制度协调能力维度。这是现有文献尚未识别并且在

中国情境下比较特别的一个维度。本文编制了制度能力量表，并发现制度能力是一个二阶构念，从而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测量工具。另一方面，本文发现：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是促进制度能力开发的直接因素。Autio等（2011）致力于东道国环境对国际新创企业组织层面能力形成的影响（进入国际市场之后），而本文则聚焦于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对其个体层面能力开发的影响（进入国际市场之前）。进一步地，黄胜等（2015）的研究表明制度缺失性是制度能力开发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我们则发现高管的制度多样性经历也是影响制度能力开发的重要因素。

## （二）实践意义

本研究对中国新创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启示意义。第一，制度能力是新创企业顺利实施快速国际化战略的助推器。本文支持了“制度能力有利于加快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观点。据此，对高管而言，为了使新创企业有效实施快速国际化战略，他们需要灵活应用制度能力，并探索制度优势和利用制度套利机会。从动态的角度看，由于国际化速度是一个多维的和时间性的概念（Casillas & Acedo, 2013），因此如果高管想要加快初始进入速度和进入后速度的话，那么他们需要在整个国际化过程中不断升级制度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制度能力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起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东道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存在明显差异。尽管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是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依然存在。因此，制度能力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推动新创企业快速国际化仍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经历多样化的母国制度环境是中国高管提升制度能力的务实之道。本文支持了“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有助于提升其制度能力”的观点。据此，对于中国高管而言，虽然经历多样化的国际制度环境也能提高他们的制度能力，但是经历多样化的中国制度环境不失为一种更加经济的办法。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中央政府应鼓励地方政府营造多样化的当地制度环境（例如，规范和认知制度环境），因为这种环境对于制度能力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潜在价值。然而，多样化的母国制度环境（尤其是管制环境）可能会让新创企业增加合规成本（陆亚东，2015）和难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值得注意的是，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不会自动转换为制度能力，他们需要在多样化的母国制度环境中努力学习才能提高自身的制度能力。因此，本文为我国新创企业的高管如何开发制度能力指明了方向。

第三，国际化导向是新创企业顺利实施快速国际化战略的催化剂。本文支持了“高管的国际化导向越强，制度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直接促进作用越大”的观点。据此，对于高管而言，为了提高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和制度能力对加快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有效性，他们应努力激发国际化导向。从动态的角度看，国际化导向不仅增强了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和制度能力对初始进入速度的正向影响，而且强化了它们对进入后速度的积极影响。这意味着高管需要在国际化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强烈的国际化导向才能持续不断地提高新创企业的国际化速度。

### (三)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其一，采用横截面研究设计收集数据。这使我们难以明确地推断出因果关系和捕捉新创企业快速国际化现象的动态特征。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其二，由于调查对象均为中国的国际新创企业，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可能受到限制。如果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获得了支持性数据的话，那么本研究模型的普适性会进一步增强。类似地，虽然高管的制度能力优势观是基于国际新创企业样本提出的，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适合中国的成熟企业，因为制度能力不仅可以从个体层面上升到组织层面，而且无论是对国际新创企业所特有的初始进入速度还是对一般性企业的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均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尝试获取包含成熟企业的样本以推广本研究的结论。其三，采用单个高管自评的方法来测量制度能力，其结果可能会受到自利性偏差、社会期待式作答和特殊偏差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向企业内的多个被调查者收集数据来提高测量回应的信度。

(接受编辑：马旭飞

收稿日期：2017年5月8日

接受日期：2018年1月26日)

## 附录1 制度能力的概念、维度和量表研究

扎根理论方法非常适合研究中国情境

下高管制度能力这个定义和维度尚不明确的理论构念。基于扎根理论的制度能力概念和维度研究过程如下：首先，理论抽样。理论抽样是根据建构理论的需要而进行有目的地选择样本的方法 (Glaser, 1978)。由于本文是要构建高管在与制度环境互动方面的能力，因此本文选取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国际新创企业高管作为研究对象。结合作者的人际关系网络，研究样本是来自广东和广西的这类高管。其次，数据收集。对这类高管实施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以获取一手资料，同时通过多种来源收集二手资料。到理论饱和时，我们停止数据收集。整个数据收集过程历时2年，共计对40位高管进行了访谈，收集了174页的纸质版资料、118页的电子版资料和32G的录音材料。最后，编码。我们主要对深度访谈的材料做编码分析，其他资料用于事件佐证和比较。NVivo 8软件的编码比较查询结果显示编码一致性的百分比为0.86，这表明三位编码员归类的一致性较高，编码信度达到要求。通过开放性编码，从40例访谈资料中抽取了984个初始概念。通过选择性编码，从984个初始概念中提炼出关联度和频率较高的23个子-范畴 (访谈数据占比为97%)，并进一步合并、分类为5个核心范畴：制度感知、适应、协调、变革和更新能力。通过理论性编码，从5个核心范畴中提炼出制度能力这一中心范畴。

基于制度能力的多维构思，编制出对应5个维度的23条题项——作为制度能力的原始量表。为确保内容效度，作者邀请广州火炬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桂林高新区管委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相关专家对原始量表进行评价。

21 条题项的基于专家判断法的内容效度比都为 1，这表明制度能力量表的内容效度较为理想。根据他们的意见，通过合并与删减题项，制度能力的预试量表由 21 条题项组成。制度能力量表开发的调查共发出问卷 282 份，回收 251 份，回收率 89%，其中有效问卷 228 份。本文采用相关性检验和同质性检验以筛选和保留制度能力量表个别题项：其一，量表各题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均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均大于 0.35，这说明预试量表所有题项都应该保留；其二，量表整体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4，并且删除任何一条题项后的量表系数均小于量表整体的系数，这表明预试量表的信度较高，应保留该量表的 21 条题项。

本研究把有效问卷随机平均分成两等份 (228/2=114)：一份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而另一份则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这样有助于检验量表的稳健性 (吴明隆, 2010)。当题项的平均共同度高于 0.70 和因子载荷足够高时，非常小的样本量 ( $n < 50$ ) 也能获得合理的解。然而，本研究的样本量满足因子分析样本量标准：样本量不少于题项数的 5 倍且不少于 100，因此有利于提高因子分析的可靠性。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删除了因子载荷低于 0.40 和交叉载荷在 0.35 以上的 2 条题项之后，本文采用主成分—直交旋转—最大变异法所抽取的 5 个因子解释了总体变异的 68.62%，而且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在 0.52~0.84。这说明因子结构较为理想。根据各个因子的题项构成，作者分别

对析出的因子依次命名为：制度适应、感知、协调、更新和变革能力。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在 0.000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一阶因子之间还可能存在共同的高阶因子。在验证性因素分析过程中，本文提出三个竞争模型：单因子模型、一阶五因子模型和二阶五因子模型。这三个模型的基本适配度均为良好。二阶五因子模型与样本数据的各项拟合指标均优于单因子模型。虽然二阶五因子模型的部分拟合指标略低于一阶五因子模型，但是拟合并未显著恶化 ( $\Delta\chi^2 = 10.94 < 11.07$ ,  $\Delta df = 5$ ,  $\alpha = 0.05$ )。因此，从简约的角度考虑，制度能力是由制度感知能力、制度适应能力、制度协调能力、制度变革能力和制度更新能力 5 个一阶因子所构成的二阶结构。

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量表的整体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5，并且 5 个维度的组合信度 (CR) 介于 0.73~0.87，这说明制度能力的 5 个维度结构具有理想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即该量表具有较高信度。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平均变异萃取量 (AVE) 在 0.52~0.61，这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5 个一阶因子在二阶因子“制度能力”的标准化载荷分别为：0.91、0.89、0.85、0.81、0.78，这也说明制度能力的 5 个维度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5 个一阶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 (0.48~0.68) 均低于上述 AVE 的平方根 (0.72~0.78)，这说明制度能力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附录 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n = 349)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初始进入速度	—																		
2. 国家范围速度	0.13*	—																	
3. 国际承诺速度	0.06	-0.04	—																
4. 制度能力	0.19**	0.22**	0.23**	—															
5. 制度不确定性感知	0.03	0.01	0.06		—														
6. 制度多样性经历	0.24**	0.17**	0.24**	0.03	—														
7. 国际化导向	0.23**	0.13*	0.25**	0.02	0.04	0.10*	—												
8. 高管年龄	-0.05	0.03	0.09	0.06	0.07	0.09	-0.08	—											
9. 高管国际化经验	0.27***	0.32***	0.29	0.01	0.02	0.24**	0.07	—											
10. 教育程度	0.14*	0.19**	-0.08	0.07	0.05	0.15*	-0.09	0.13*	—										
11. 性别		0.02	0.04	0.09	0.08	0.01	0.06	0.03	0.07	0.08	0.05	—							
12. 企业规模	-0.08	0.07	0.12*	0.11*	0.03	0.08	0.12*	0.09	0.34***	0.08	0.11*	—							
13. 企业年龄	-0.09	0.08	0.12*	0.11*	0.02	0.04	0.07	0.11*	0.10*	0.06	-0.02	0.14*	—						
14. 偶尔研发	0.08	0.12*	0.09	0.02	0.01	0.10*	0.06	0.12*	0.07	0.03	0.05	-0.04	—						
15. 经常研发	0.28**	0.30**	0.10*	0.02	0.13*	0.08	-0.05	0.14*	0.06	0.07	0.09	-0.08	—						
16. 行业类型 I	0.14*	0.11*	0.18**	0.06	0.04	0.02	0.10*	-0.01	0.11*	0.14*	0.09	-0.08	-0.02	0.15*	—				
17. 行业类型 II	-0.11*	-0.06	0.38**	-0.03	-0.02	-0.11*	-0.01	-0.03	-0.13*	0.10*	-0.04	-0.09	0.05	0.02	0.03	—			
18. 省级制度环境	0.01	0.03	0.04	0.08	0.02	0.07	0.06	0.05	0.12*	0.03	0.01	0.05	-0.03	0.13*	0.07	0.02	—		
均值	4.231	1.074	0.068	3.821	4.052	0.084	3.976	1.580	8.053	0.850	0.900	5.096	0.724	0.152	0.624	0.390	0.170	8.012	
标准差	1.072	0.304	0.076	1.002	0.957	0.102	0.857	0.943	6.839	0.237	0.732	1.754	0.219	0.181	0.274	0.283	0.115	0.894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下同；括号内的数值为 AVE 的平方根。

## 参考文献

- [1]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 [2] 黄胜、叶广宇、周劲波、靳田田、李玉米：《二元制度环境、制度能力对新兴经济体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的影响》，《南开管理评论》，2015 年第 3 期。
- [3] 黄胜、周劲波：《创业机会视角下的中国企业早期国际化研究》，《科学学研究》，2013 年第 2 期。
- [4] 陆亚东：《中国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窘境与未来》，《外国经济与管理》，2015 年第 3 期。
- [5] 宋渊洋、李元旭：《制度环境多样性，跨地区经营经验与服务企业产品市场绩效——来自中国证券业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13 年第 1 期。
- [6]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14 年第 5 期。
- [7] 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 [8] 项国鹏、李武杰、肖建忠：《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制度能力：中国企业家的实证研究及其启示》，《管理世界》，2009 年第 11 期。
- [9] 杨忠、张晓、陈扬、廖文彦：《“天生全球化”企业持续成长驱动力研究——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差异性跨案例分析》，《管理世界》，2007 年第 6 期。
- [10] 周劲波、黄胜、叶广宇：《组织学习、合法性与国际新创企业进入后速度》，《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 年第 11 期。
- [11] Acedo, F. J., & Jones, M. V. 2007. 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Insights and a comparis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exporters and domestic firm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2 (3), 236-252.
- [12] Adner, R., & Helfat, C. E. 2003. Corporate effects and dynamic managerial capabil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4 (10), 1011-1025.
- [13] Anderson, J. C., & Gerbing, D. W. 198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 (3), 411-423.
- [14] Argote, L. 1999.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reating, retaining and transferring knowledge*. Norwell, MA: Kluwer Academic.
- [15] Arregle, J. L., Miller, T. L., Hitt, M. A., & Beamish, P. W. 2016. How does 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ffect MNE interna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7 (6), 697-722.
- [16] Autio, E., George, G., & Alexy, O. 2011.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capability development—qualitative evidence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5 (1), 11-37.
- [17] Autio, E., Sapienza, H. J., & Almeida, J. G. 2000. Effects of age at entry, knowledge intensity, and imitability on international growt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5), 909-924.
- [18] Baker, T., Miner, A. S., & Eesley, D. T. 2003. Improvising firms: Bricolage, account giving and improvisational competencies in the founding process. *Research Policy*, 32 (2), 255-276.
- [19] Barkema, H. G., Bell, J. H., & Pennings, J. M. 1996. Foreign entry, cultural barriers, and learn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7 (2), 151-166.
- [20] Barkema, H. G., & Shvyrkov, O. 2007. Does top management team diversity promote or hamper foreign expans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8 (7), 663-680.
- [21] Banalieva, E. R., & Dhanaraj, C. 2013. Home-region ori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trateg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4 (2), 89-116.
- [22] Bangara, A., Freeman, S., & Schroder, W.

2012. Legitimacy and accele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 Ind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7 (4), 623-634.
- [23] Casillas, J. C., & Acedo, F. J. 2013. Speed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15 (1), 15-29.
- [24] Cesinger, B., Fink, M., Koed Madsen, T., & Kraus, S. 2012. Rapidly internationalizing ventures: How definitions can bridge the gap across contexts. *Management Decision*, 50 (10), 1816-1842.
- [25] Chang, S. J., & Rhee, J. H. 2011. Rapid FDI expans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2 (8), 979-994.
- [26] Chetty, S., Johanson, M., & Martín, O. M. 2014. 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9 (4), 633-650.
- [27] Child, J. 1972.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strategic choice. *Sociology*, 6 (1), 1-22.
- [28] Coviello, N. 2015. Re - thinking research on born global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6 (1), 17-26.
- [29] Cyert, R. M., & March, J. G. 1963. *A behavior theory of the firm*. Prentice - 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 [30] Delios, A., & Henisz, W. J. 2003. Policy uncertainty and the sequence of entry by Japanese firms, 1980-1998.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4 (3), 227-241.
- [31] Dichtl, E., Koeglmaier, H. G., & Mueller, S. 1990.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as a precondition for export succ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1 (1), 23-40.
- [32] Easterby-Smith, M., Araujo, L., & Burgoyne, J. (Eds.). 1999.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 Sage.
- [33] Eisenhardt, K. M., & Martin, J. A. 2000. Dynamic capabilities: What are the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 (10-11), 1105-1121.
- [34] Eisenhardt, K. M., & Sull, D. N. 2001. Strategy as simple rul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9 (1), 106-119.
- [35] Eriksson, K., Johanson, J., Majkgard, A., & Sharma, D. D. 1997. Experiential knowledge and cost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8 (2), 337-360.
- [36]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Algebra and statistic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 (3), 382-388.
- [37] Fuentelsaz, L., Gomez, J., & Polo, Y. 2002. Followers' entry timing: Evidence from the Spanish banking sector after deregul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 (3), 245-264.
- [38] Gao, G. Y., & Pan, Y. 2010. The pace of MNEs' sequential entries: Cumulative entry experience and the dynamic proc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1 (9), 1572-1580.
- [39] Glaser, B. G.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Advanc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grounded theor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 [40] Hambrick, D. C., & Mason, P. A. 1984.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9 (2), 193-206.
- [41] Helfat, C. E., & Martin, J. A. 2015. Dynamic

managerial capabilities: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managerial impact on strategic chan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41 (5), 1281–1312.

[42] Henisz, W. J. 2003. The power of the Buckley and Casson thesis: The ability to manage institutional idiosyncras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4 (2), 173–184.

[43] Hennart, J. F. 2014. The accidental internationalists: A theory of born global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8 (1), 117–135.

[44] Holburn, G. L., & Zelner, B. A. 2010. Political capabilities, policy risk,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rategy: Evidence from the global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1 (12), 1290–1315.

[45] Jackson, G., & Deeg, R. 2008. Comparing capitalisms: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 (4), 540–561.

[46] Kelava, A., Werner, C. S., Schermelleh – Engel, K., Moosbrugger, H., Zapf, D., Ma, Y., & West, S. G. 2011. Advanced nonlinear latent variable modeling: Distribution analytic LMS and QML estimators of interaction and quadratic effect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8 (3), 465–491.

[47] Keupp, M. M., & Gassmann, O. 2009.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 review and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the field. *Journal of Management*, 35 (3), 600–633.

[48] Khavul, S., Pérez – Nordtvedt, L., & Wood, E. 2010. Organizational entrainment and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from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5 (1), 104–119.

institutional context, social networks, and new vent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6 (6), 388–399.

[50] Kiss, A. N., & Danis, W. M. 2010. Social networks and speed of new vent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during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 conceptual mod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8 (3), 273–287.

[51] Kiss, A. N., Danis, W. M., & Cavusgil, S. T. 2012.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emerging economies: A critical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7 (2), 266–290.

[52] Knight, G. A., & Kim, D. 2009.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etence and the contemporary fir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0 (2), 255–273.

[53] Levitt, B., & March, J. G. 1988.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 (1), 319–338.

[54] Lu, Y., Zhou, L., Bruton, G., & Li, W. 2010. Capabilities as a mediator linking resourc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in an emerging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1 (3), 419–436.

[55] Luo, Y., Xue, Q., & Han, B. 2010. How emerging market governments promote outward FDI: Experi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5 (1), 68–79.

[56] March, J., & Olsen, J. 1975.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under ambigu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cy Review*, 3 (2), 147–171.

[57] Meyer, K. E., & Estrin, S. 2007. *Acquisition strategies in European emerging econom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58] Miller, D., & Shamsie, J. 1999. Strategic responses to three kinds of uncertainty: Product line simplicity at the Hollywood film studios. *Journal of Manage-*

ment, 25 (1), 97–116.

[59] Milliken, F. J. 1987. Three types of perceived uncertainty about the environment: State, effect, and response uncertain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2 (1), 133–143.

[60] Nummela, N., Saarenketo, S., & Puumalainen, K. 2004. A global mindset—a prerequisite for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iz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1 (1), 51–64.

[61] Oviatt, B. M., & McDougall, P. P. 1994.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5 (1), 45–64.

[62] Oviatt, B. M., & McDougall, P. P. 2005. Defining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odeling the 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9 (5), 537–554.

[63] Peng, M. W., Wang, D. Y., & Jiang, Y. 2008.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 (5), 920–936.

[64] Perkins, S. E. 2014. When does prior experience pay?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9 (1), 145–181.

[65] Perkmann, M., & Spicer, A. 2007. Healing the scars of history: Projects, skills and field strategies i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Organization Studies*, 28 (7), 1101–1122.

[66] Piaskowska, D., & Trojanowski, G. 2014. Twice as smart? The importance of managers' formative-year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and foreign acquisition decisions.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5 (1), 40–57.

[67] Prashantham, S., & Floyd, S. W. 2012. Routine microprocesses and capability learning in internation

-al new ventur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3 (6), 544–562.

[68] Prashantham, S., & Young, S. 2011. Post-entry speed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5 (2), 275–292.

[69] Preacher, K. J., & Hayes, A. F. 2008.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0 (3), 879–891.

[70] Rialp, A., Rialp, J., & Knight, G. A. 2005. The phenomenon of early internationalizing firms: What do we know after a decade (1993–2003) of scientific inquir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4 (2), 147–166.

[71] Ronen, S., & Shenkar, O. 2013. Mapping world cultures: Cluster formation, source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4 (9), 867–897.

[72] Rosenbloom, R. S. 2000. Leadership, capabilitie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CR in the electronic er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10–11), 1083–1103.

[73] Sapienza, H. J., Autio, E., George, G., & Zahra, S. A. 2006. A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on the effects of early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firm survival and growt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1 (4), 914–933.

[74] Scott, W. R. 1995. *Institutions & organizations (1st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75] Shrader, R. C. 2001. Collabor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foreign markets: The case of young high-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4 (1), 45–60.

[76] Singh, J. V. 1986. Performance, slack, and risk taking i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9 (3), 562–585.

[77] Stinchcombe, A. L. 1965.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 J. G. March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 Rand McNally.

[78] Szulanski, G. 1996. 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 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7 (S2), 27-43.

[79] Teece, D. J. 2014. A dynamic capabilities - based 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 (1), 8-37.

[80] Tsoukas, H., & Mylonopoulos, N. 2006. *Organizations as knowledge systems: Knowledge, learning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81] Vermeulen, F., & Barkema, H. 2002. Pace, rhythm, and scope: Process dependence in building a profitabl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 (7), 637-653.

[82] Walsh, J. P. 1995. 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al cognition: Notes from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Organization Science*, 6 (3), 280-321.

[83] Weerawardena, J., Mort, G. S., Liesch, P. W., & Knight, G. 2007. Conceptualizing accele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born global firm: A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2

(3), 294-306.

[84] Witt, M. A., & Lewin, A. Y. 2007.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escape response to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4), 579-594.

[85] Yamakawa, Y., Peng, M. W., & Deeds, D. L. 2008. What drives new ventures to internationalize from emerging to developed economi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2 (1), 59-82.

[86] Yiu, D. W., Lau, C., & Bruton, G. D. 2007. International venturing by emerging economy firms: The effects of firm capabilities, home country networks,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4), 519-540.

[87] Zahra, S. A., Ireland, R. D., & Hitt, M. A. 2000.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by new venture firms: International diversity, mode of market entry,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5), 925-950.

[88] Zollo, M., & Winter, S. G. 2002. 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13 (3), 339-351.